

职工工资问题,而且解决了流动资金,使产供销步入良性运行轨道,利润扭亏为盈。他虽然做出了成绩,但并没有从此轻松,反而不时地遇到方方面面的“折腾”。

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97年底。主管局为了当年全系统利润实现9 000万元,局长下令厂长,厂长又下令他,将年度会计报表利润数再加20万元。厂长对他承诺:“将这事办妥后,厂里帮你调一套110m²的住房。”可他对厂长说:“大房子我是需要的,但这报表我不能改,这样做违反《会计法》。”这下惹怒了厂长和局长,局长亲自带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厂里,并把表哥调到车间上班。局长说不信这20万利润就弄不出来!家人们都劝他:“你大房子不要,办公室不坐,跟领导对着干,还要到车间去上班,何苦呢?”他没有理睬,依然去了车间。10天过去了,工作组没有进展,又到会计中介机构搬“救兵”。然而,真的怎能变成假的,这件事惊动了县财政局,在财政部门的干预下,表哥恢复了职务。当时,他激动地拉着财政局同志的手说:“你们是俺们会计人的后盾,俺要沿着这条诚信之路走到底。”

表哥虽然退休了,但他那些不平凡的会计经历会一直影响着我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东台市财政局)

责任编辑 刘黎静



□ 潘柳松

父亲于1950年分配到县银行工作,当年就拿了全县珠算大赛的第二名。之后很快被提升为主办会计、会计股长。

1957年末,市行认为县行里有一笔账务处理有政治问题,就派调查组来追查此事。经调查,责任是行长的。调查组连夜召开全行职工大会,撤掉行长一切职务,并由父亲临时接任其工作。

大家向父亲表示祝贺,但父亲一直默默无言。

父亲一夜无眠。第二天清晨,他急匆匆地起床,又急匆匆地赶路,5点多的时候,在八里外的小轮码头,挡住了调查组一行。

调查组长高兴地握着父亲的手:“你这么早赶来送什么,过两天我还要送任命文件来呢。”

父亲迫不及待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想了一晚上的话:“账是按照会计制度做的,我和行长都没有错误。如果因为这个我被提拔,那我就背叛了会计制度。”

父亲和调查组激烈地争辩。调查组只得又返回行里。

之后调查组重新作出决定:经重新调查,责任主要在我父亲,撤销其会计股长职务,划为右派,拉板车改造,月工资由51元降到15元。因为父亲这样做,不但使自己坠入了深渊,也把调查组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。

两年后,政治风声有所减弱,加之父亲“改造”得不错,行里让父亲重新回到了会计岗位。恢复了职务的行长私下找父亲谈:“老潘,你那右派划得有些冤枉,先给你‘摘帽’,然后再想法平反吧。”

父亲坚决不同意:“我是会计,按会计制度办事没有错。我不是右派,要平反就平反,不存在‘摘帽’问题。”因为“摘帽”只说明改造好了,平反则说明当年右派划错了,说明坚持会计制度是对的。

行长无奈地说:“那我争取吧,但

你以后一定要谨慎。”

那时候,县里电力供应极不正常,煤油灯是必备品。灯罩易碎,但限于条件,行里规定一年只能换一次。行长不到一年就打碎了灯罩,他瞄到职工老张有一年多没换,便叫他来报销。不知谁透露了消息,父亲接过老张的发票反复地端详,老张急得直叫:“9分钱的发票看什么?能看出个花来?”父亲不吭声,逼急了才哼一句:“发票又不是你的。”歇了一会又冒出一句:“假账我不会做。”

“什么假账,9分钱也叫假账?”老张不依不饶。

“1分钱也是假账。我不能背叛会计制度。”父亲脸胀得通红。

“行长白对你好了。你这右派想当到底了。”老张急得大叫。

又僵持了一会,父亲额上慢慢沁出了汗,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9分钱,排在桌上,又慢慢地撕掉了发票。

因这件事,父亲到了1978年,才成为全国最后一批摘下右派帽子的人。这个时候,当年父亲的下级,已经全部成了父亲的上级,有的还成了省行、市行的领导。

1998年,父亲退休。在欢送会上,父亲不好意思地嗫嚅着说自己这些年进步很慢,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。年轻的新行长站了起来,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,满含深情地紧握着父亲的手:“我们国家正因为有你这样一批永不背叛会计制度的老同志,才有了今天的进步和发展。”然后送给父亲一副他亲手书写的对联:“三十八年过去,未说假话;一万多个日子,不做假账。老父亲接过对联,双手颤抖,一个劲地说:“此生足矣!此生足矣!”

2002年4月13日,父亲去世。他走时很安详,只带走了那副对联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铜陵市

人民银行内审科)

责任编辑 刘黎静